

Z 文人逸事

赵朴初填词赞教师

夏明亮

1979年9月，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在北戴河联合召开23个省市自治区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前，应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之邀，赵朴初特地为这次会议填词《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礼赞人民教师：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伍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跃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

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襟寒温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

陶行知当衣办学

佟雨航

1938年9月，陶行知决定创办一所“难童学校”，专门接收和培育那些流落街头的难童。

1939年7月，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陶行知便在重庆合川县地处偏僻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取名“育才学校”，并担任校长，学生中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学校虽然条件艰苦，却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前来教学和兼课。音乐家贺绿汀、电影艺术教育家家章泯、诗人艾青、舞蹈家戴爱莲、画家陈烟桥等分别担任各组组长，翦伯赞、何其芳、丰子恺、田汉、姚雪垠等知名学者也常来学校兼课，学校师生最多时有160多人。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陶行知经常要四处奔波筹集办学经费，还写信向各界人士求援。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赵超构等民主人士都给育才学校寄过钱和物，周恩来、邓颖超等革命家也多次派人送来办学所需的物资。尽管有各界援助，陶行知的

办学之路还是步履维艰。一次，运送物资和粮食的汽车在路上遭遇日军，不得不绕道多走了几天的路程。而此时育才学校已经钱尽粮绝，百余名师面临断炊挨饿的局面。陶行知情急之中把衣柜里几件八九成新的呢料大衣和裤子拿去县城的当铺，换成钱买了粮食和蔬菜，总算解决了全校师生一天的口粮。

陶行知能筹集到的办学经费越来越少，他不得不频频光顾当铺，当一些私人物品以解燃眉之急。后来陶行知家徒四壁，仅剩下一套衣服。每次洗了衣服后，由于没有别的衣服可替换，陶行知冬天就围着被子在床上看书，夏天就光着膀子在桌子前写字。等衣服晾干后，再穿上去给学生们上课。

育才学校坚持办了7年，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时才被迫终止。7年间，育才学校共招收了600多名难童学生，后来，其中300多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43名学生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有21名学生成了革命烈士。

吴宓诲人不倦

王剑

吴宓上课，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吴宓曾先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培养出了像钱锺书、曹禺、李健吾、季羨林、吕叔湘、许国璋、许渊冲等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比课堂上的严谨，学生们更喜欢吴宓课下的随和。有一次，吴宓和学生们一起走在街上。忽然对面开来一辆汽车，他连忙举起手杖，一面挡住汽车，一面催着女学生们赶快通过人行横道，这才让开道路。每逢考试，吴宓总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晚年，吴宓回到陕西老家。有一天，他与胞妹吴须曼闲谈，获知乡间中学至今尚未开设英语课，询问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宓急切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啊？我可以讲课……”此时，吴宓已疾病缠身。但他心系乡村教育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华罗庚巧护李寿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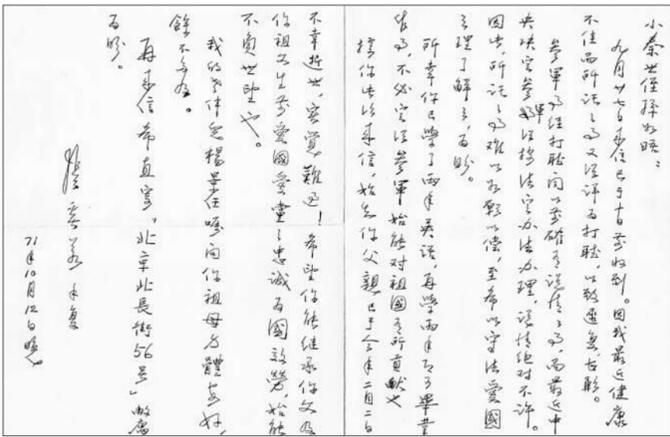
周星

李寿慈机智地摆脱了军警的检查，来到了华罗庚的宿舍。不料华罗庚的宿舍里也早来了军警。此时华罗庚正坐在床上，三个军警正询问他什么。军警们见李寿慈只身闯入，大声斥问他是什么人。面对军警的盘问，李寿慈冷静而机智地回答自己来华先生宿舍的目的，并主动掏出“王乃梁”的借书证。就在军警盘查证件时，华罗庚故意高声说：“密斯特王，先坐下来歇歇吧！这几位长官，也不过是例行公事。”军警停下来听他们谈话，华罗庚又故意埋怨说：“有什么难题做不出，一大清早就跑来找我？胡适之先生早就告诫你们平日要‘多研究些学问’，你们平日念书大都吊儿郎当，现在临时抱佛脚来了吧！”华罗庚骗走了军警，才松了口气说：“好险啊！”又问他那个“借书证”的由来，李寿慈如实告知，华罗庚不由感叹道：“这就是中国古话的‘得道者多助’啊！”

三代之谊逾甲子

——记张奚若先生与成家三代交谊

成小泰



张奚若给作者的亲笔信

1947年1月，《清华旬刊》创刊，成景暉撰写《张奚若先生访问记》：“是积雪未融又刮大风的下午，我们去拜访张先生。一进门，那种亲切温暖的意味，使我们久坐而不愿出来了。”访谈中，张奚若纵谈宪政，并痛斥国民党政府“既无能，又贪污”，还论及美国援助问题、苏美能否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内战局的展望。

1948年5月，张奚若应成景暉之请，再次为《清华旬刊》第六期撰文《不要辜负了时代》：你们不久都要变成中国社会的领导或做中坚人物，对于做领导或做中坚者要胜任，现在一定要在思想和技能方面尽量地充实你们……努力吧，时代绝不辜负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辜负时代！

1948年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被国民党军军警查封，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15日，朋友袁玄晖告诉成景暉，清华大学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让他转告：“成景暉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19日，成景暉仓促离开清华园，投奔冀东解放区，未及与张奚若告别。

1949年10月，张奚若在北平见到成柏仁，才知晓成景暉（至解放区更名“青阳”）的下落。1952年初，成景暉自秦皇岛途经北京返陕探亲，拜见了张奚若。此后，他每次去北京出差，都会探望张奚若。成景暉最后一次拜见张奚若，是1962年初，他随中共陕西省代表团出席七千人大会，离京前匆匆辞别。

1971年2月初，父亲骤逝，家境困顿，我因政审问题，仍在陕西麟游荒僻山乡务农。忙完秋收，我背些新粮回城，多方打听消息。9月中旬后，我萌发了参军念头，于是，找来近期报纸，翻找熟悉的名字。我以为，他们名字见报，就证明已获解放，找出可托之人，便挨个儿写信，信写得浅陋，无非先自我介

绍，继而述说困境，最后表示渴望从军、保卫祖国云云。

10月中旬，收到第一封回信，寄自北京。我急忙拆开信封，一看是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先生的复信：

小泰世侄孙如晤：九月二十七日来信已于十日前收到。因我最近健康不佳而所托之事又经详为打听，以致迟复为歉。参军事经打听以前确有说情之事，而最近中央决定参军须按法定办法办理，说情绝对不许。因此，所托之事难以如愿以偿，至希以守法爱国之理了解之，为盼。

所幸你已学了两年英语，再学两年即可毕业做事，不必定须参军始能对祖国有所贡献也。接你此封来信，始知你父亲已于今年二月二日不幸逝世，实觉难过！希望你能继承你父及你祖父生前爱国爱党之忠诚为国效劳，始能不负世望也。

我的老伴儿杨景任问你祖母身体安好，余不多述。再来信希直寄“北京北长街56号”敬虞为盼。

张奚若手复
71年10月12日晚上

粗读一过，见参军无望，不免有些沮丧，把信给母亲看。她读罢说：“应听张爷爷的话，不必非要参军，还是安心务农，等待机会的好。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耐心等吧。”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捧读来信多遍，盼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校园。

1972年暮春，我有幸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母亲催我写信，把上学之事禀告张奚若先生。1973年，报载赵元任先生返国，去医院探望老友张奚若先生，我才知道奚若爷病重。那年7月，奚若爷去世，讣告见报，我伤心落泪。

40多年之后，2013年2月20日，雪后甚冷，我去武圣北路六号院拜访张文朴叔（张奚若先生哲嗣，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电梯门打开，文朴叔一见到我就说：“你太像景暉了！”叙谈中，文朴叔聊起往事，唏嘘不已：“那会儿，你爸爸常来家里，用陕西话说笑话，把外婆和家里人逗得直乐……”

我将《成柏仁纪念文集》《柏仁文存》《成青阳（景暉）九十诞辰纪念》以及奚若爷函复印件呈递文朴叔，他边读边评：“太珍贵了！太珍贵了！你看，他还写了‘老伴儿’，哈哈。”文朴叔说，他父亲很少给人题字，信写得更少，除致函老友胡适、梅贻琦、任鸿隽等，据他所知，20世纪50年代，陕西有十多个学生来京上大学，致函奚若爷，他很高兴，复信学字并宴请，再有就是给我写过信。

涉笔至此，遥想先辈当年，相逢人间而重情谊，足为后世矜式。（本文作者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翻译学系副教授）

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教育家，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张奚若先生，与成家祖孙三代（先祖父成柏仁、先父成景暉以及笔者成小泰）有着延续65载的深厚情谊，从清末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风云动荡的年代，何其不易！

张奚若与成柏仁之结义

成小泰

71年10月12日晚上

1906年12月初，张奚若与我祖父成柏仁结义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他们是预科丁班（即第四班级）同学。当时班里有同学30余人，有秀才多名（成柏仁榜列耀州12名秀才第一名），同学还有曹世英（字俊夫，白水秀才）、杨鹤庆（字叔吉）等，年长之刘润泽，30余岁，吴宓年仅13岁。

1908年春夏，宏道学堂爆发“学潮”，张奚若与成柏仁等因革命而遭学堂除名。张奚若与成柏仁志同道合，相继离开宏道学堂。张奚若入上海中国公学，继续求学，其间，结识于右任等志士，加入同盟会；成柏仁返回耀州，也加入同盟会。

九一八事变后，成柏仁期以报业启迪民智、救国救民，经艰难筹备，于1935年3月，创办《秦风周报》，倡言：述往事以励来兹，缀旧闻而策后起，同赴国难，光我秦风。

成柏仁向老友张奚若约稿，为故乡教育献策。张奚若发表了《陕西的教育问题》《国难的展望》《今日学生运动之意义及影响》等针砭时弊的文章。

《秦风周报》自创刊至停刊，不足两年，出版84期，成柏仁每期必著文，在国势危下，标举士气，伸张民气，克尽言责。

1936年5月，成柏仁创办《秦风日报》，聘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李浩然（《新报》总编辑）等8人为董事，特约张奚若、郭沫若等贤达撰写专论。成柏仁著文重申，发行人及董事“是对西北革命，对民国建立，尽过微力，拼过生命的一群……自辛亥以前的同盟会起，直至现在的全面抗战止，固守西北革命党人的人格，从不蝇营狗苟地妄求个人的权利”。

1949年，成柏仁受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与至交张奚若重逢。此后，成柏仁主管西北以及陕西文教，力促张奚若（时任高教部长）等人动员清华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来西北分校。成柏仁曾在上海求学、生

魏巍的革命师生情

郑学富

著名作家魏巍曾说：“有一个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帮助了我。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同志，我永远不能忘怀他。”这个人就是黄正甫，一位早期共产党员，魏巍正是在他的指引和帮助下，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共同的理想、志向，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魏巍小学毕业后，因家中生活困难，进入郑州四年制的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上学。他在郑州求学期间的一个冬季，几乎天天碰到一个人，穿蓝大褂、戴毡帽，有点塌鼻梁，面貌不算英俊，面色黄而憔悴，疑似营养不良。见面时总是点点头，挺和悦的。此人便是黄正甫，魏巍同学的一个叔叔。

黄正甫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白河县卡子乡东坝村，15岁赴郑州祖父家，就读郑州中学，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遂到湖北省立一中读书。受校董事长董必武、校长刘觉民、教

员陈潭秋等人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黄正甫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起义。后辗转至郑州、北平，宣传抗日，曾两次被捕。被释后，先后在新蔡私立小学、郑州师范教书，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抗战，并坚持文学创作，时有作品发表。

魏巍通过同学介绍，前去拜访黄正甫，黄正甫住在黄家大院的旧宅里，二十六七岁的年纪，比魏巍大11岁，谦恭和悦、思想进步、热爱文学。魏巍见他用的稿纸很考究，又白又细，印着银灰色的格子，字书写得也是一笔一划，很认真，就连删去的字也涂得整整齐齐。魏巍有时见他写给王统照的信，有“请按冗一阅”等谦辞。魏巍读他的作品，知道他的观点是和劳苦大众一致的。魏巍很崇敬他，经常向他请教问题。黄正甫也很喜欢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经常向他推荐一些进步报刊和书籍。魏巍与黄正甫从相识、相知进而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黄正甫和魏巍谈的

不仅是文学创作，更多的是政治时局和抗日形势，在他的引导下，魏巍成为一名追求进步、思想活跃和关心抗日时局的青少年。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9月，魏巍听说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招生的消息，想前往报考，便来找黄正甫商量。当黄正甫得知魏巍的心愿后，当即表示赞同，并给西安的两位朋友写了介绍信，又掏出一些钱一并交到魏巍的手中，叮嘱说：“你拿着这封信先去西安找我的这两位朋友，他会推荐你上抗大的。这点钱权当路费。”直到此时，魏巍才知道黄正甫是一名共产党员。

魏巍怀揣着介绍信，背着舍不得丢的十几本书和诗稿、文稿以及简单的衣物，星夜兼程赶到西安，找到了黄正甫的朋友，也去了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如愿，可他看到了贴在墙上的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的广告。魏巍果断地又折返

潼关，北渡黄河，辗转来到了赵城县（今洪洞县）马牧村，找到了115师军政干部学校，他在报名时将“魏鸿杰”改为“魏巍”。他被编入115师随营学校的学兵队，一个多月后，115师军政干校并入了晋冀豫太行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改为抗大分校），魏巍编入抗大第4期政治队学习。1938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送走魏巍后，黄正甫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加入第一战区第四游击队，任剧团副团长。1939年冬，他离开该部奔赴延安。初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转鲁艺文学系，经郭琦介绍重新入党。而此时，魏巍已在抗大毕业，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

在烽火岁月里，二人天各一方，音信隔绝。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二人才联系上，经常书信往来。

黄正甫于1975年离休，晚年患上了不治之症，魏巍虽然寄去了一些药物，但是也无济于事。黄正甫于1980年7月在武汉病故，享年71岁。当时魏巍作为聂荣臻元帅传记小组成员之一正在北戴河，惊悉噩耗而无法分身前往，于是发去唁电和挽联悼念这位革命引路人：“星落楚天，江风飒飒，怀尔前驱战士；云横燕山，海浪漫漫，哭我益友良师。”魏巍还撰写了纪念文章《无名作家忘年朋友》，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